

## 第五章 結論

### 壹、研究結果

本研究目的，在尋找報社記者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抵抗對象包括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它的重要意義在於，記者要爭取新聞自主權，要保障在媒體環境中的新聞自主空間，就必須有能力抵抗來自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壓力。從記者的實際工作環境觀察，記者、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三者間，是一個互動的三角關係。也就是說，記者要完成每日工作，不是只跟消息來源互動即可，也不是只處理與媒體組織之間的關係，記者必須隨時處理來自雙方的壓力。

本研究引用傅科的權力控制觀點，看待媒體環境中，來自組織和消息來源的權力控制真實，以及記者可以施行的迂迴抵抗作為。因此我們提出，來自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權力控制軌跡，並非僅如傳統權力控制觀點所言，只有直接、粗暴的形式，還有間接、柔順的形式存在；我們提出，記者要生存並抵抗，就不是如傳統的抵抗手段，以直接、粗暴的形式讓權力的控制不存在，而是以另一種迂迴的抵抗作為，讓記者可以生存並抵抗。

當我們從傅科的權力軌跡裡，找到記者可以生存並抵抗的可能性後，接下來即是要找尋記者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我們從文獻中，分析出七種記者可以使用的權力基礎，包括專家權、說服權、資訊權、合法權、參照權、關係權和機會權。並就其定義，歸納整理為三種記者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包括專業知識資源、職場地位資源，和良好關係資源。

因此，本研究提出四個問題，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對記者的控制形式有哪些？記者面臨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雙重壓力下的情境類型有哪些？記者是否能進行迂迴抵抗？記者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有哪些？

為回答這四個問題，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依照過去文獻提供的理論基礎為訪談大綱，訪問十位線上記者，包括政治組記者四位、社會組記者二位、財經組記者二位、影劇藝文組記者二位，年資都在五年以上，採訪經驗均相當豐富，其中有七位記者待過二家以上報社。

研究結果充分回應文獻探討內容，包括來自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控制形式，有直接控制形式、間接控制形式、自我控制形式；記者面臨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雙重壓力下的情境類型，包括對立型、一致型和偶發事件型；記者可以迂迴抵抗，只是抵抗的限制仍然存在，因此經常難以持久。

而記者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本研究分析發現三大類抵抗資源，包括專業知識資源、職場地位資源，和良好關係資源。在專業知識資源上，採訪知識、寫作知識和路線知識，都是記者經常運用的資源，且三種知識多數時候是交互、混合使用。

在職場地位資源上，除記者可從職銜高低、報社規模取得合法地位資源，研究也發現資歷深淺是影響記者職場地位的重要資源，且記者還可靠獲獎、考績優異和專業學歷提升地位。而在個人特質上，研究發現，記者認為內在特質比外在特質重要，且個人信用是記者提升職場地位的重要個人特質，當記者累積一定的個人信用資源時，抵抗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力量就較大。

過去文獻鮮少針對記者建立關係的問題進行探討，本研究發現，每位受訪者都認為，記者必須累積良好關係資源，包括建立報社和消息來源組織中的重要人物關係、重要人物周圍的關係，以及建立同業、同事的平行關係，而且要會作面子累積人情，甚至搭建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

研究結果證明來自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權力控制不是只直接控制形式而已，還包括間接控制和自我控制形式。也就是說，這三種權力控制形式，是同時存在於媒體環境中，記者在行使抵抗前，必須先看清楚，來自媒體組織或消息來源的權力控制形式為何，以及記者當下所處的情境類型，如此才能有效運用抵抗資源，行使抵抗策略。

就如本研究先前強調的，我們要尋找的是記者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不是抵抗策略，因為很難有一套一以貫之的抵抗策略，可以應用在記者所處的多變工作環境上，因此，記者必須靈活運用、組合這些抵抗資源，見招拆招，交互應用。

## 貳、研究意涵

### 一、理論方面

本研究開啓不同於傳統新聞研究的新典範，從批判角度探討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以及記者與媒體組織間的控制與抵抗，記者在完成每日工作過程中，不只是完成社會真相的報導而已，記者必須與消息來源以及與媒體組織進行一場場資源控制與抵抗的拉鋸戰。

在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研究上，過去主要在共同建構理論（co-construction）基礎架構上討論（臧國仁，1999），我們回過頭來看共同建構理論與本研究的互通相異之處發現，兩者均認同新聞不是社會真實的客觀反映，是經由新聞媒體、消息來源、以及事件或議題的各種框架轉換而來，也就是記者在報導一則新聞時，的確受到來自媒體組織、消息來源和事件議題引發的新聞情境影響，本研究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認知上，討論記者與消息來源以及記者與媒體組織間的互動問題，期望對新聞報導趨近於真實的理想做出貢獻。

但共同建構理論強調的是，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記者與消息來源、記者與媒體組織，會因互動雙方的彼此權力消漲，或隨議題發展不同階段的情境影響，而以合作、互利、敵對或交換等不同互動方式建構新聞（臧國仁，1999）。本研究提出的不同切入觀點是，在不同事件議題情境下，記者為報導一則新聞，周遊於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之間，有時不只是一種共同建構新聞的關係，還是一種搶奪資源的控制與抵抗過程，記者為能報導出符合記者自主意識的新聞，必須在平時累積資源，與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進行一場場控制與抵抗的角力戰。

因此，我們對傳統權力控制觀點提出質疑，試圖在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組織間找到權力控制的真實軌跡，本研究從組織管理領域經常引用的傅科權力控制觀點，批判新聞傳播領域對權力控制的單線看待，認為媒體組織對記者的控制，就只有威權控制形式而已，也因而忽略消息來源對記者的權力控制力量。本研究以傅科的規訓理論為基礎，提出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對記者的控制不只是直接、粗暴的形式而已，也有間接、柔順的形式在裡面，傅科強調受宰制者在組織中會自我控制符合組織期待，這也促使記者在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兩面施壓下會顯得沒有抵抗意識，但傅科也提出有權力就有抵抗的論點，支撐起記者迂迴抵抗的可行性。

本研究提出，記者要抵抗就必須掌握、累積資源，我們從過去組織管理研究領域探討上對下的權力基礎，找尋抵抗的發展力量，這樣的步伐似乎比傅科的抵抗力道更往前跨越一步，記者不只是在既有的資源上行使抵抗，本研究期望記者能以更主動積極的作為累積抵抗資源，視情境的變化蓄勢待發。研究結果也發現，愈資深的記者可以累積的資源愈多，而資歷、專業與人際互動關係的成長，也形成記者累積的有利資源。

## 一、方法方面

本研究必須收集記者的實際經驗做為資料分析，這些資料包含記者從採訪到完成報導的過程、目的、阻礙、思考、判斷、方法，以及最後報導的結果和現在看過去的反思。為能得到這樣的豐富資訊，質化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是相當適合的方法之一，訪問過程中可以讓受訪者暢所欲言，深入闡述事件過程，採半結構訪談方式，更可讓受訪者不致脫離研究者主題，當然在開始訪談之初，並未設定訪談者數量，必須到訪問資料達飽和狀態，也就是資料內容逐漸出現重覆之時，訪問即可停止，訪後以逐字稿方式紀錄再做研究分析，有利研究者更清楚看到資料呈現的內容與意義。

但我們必須提出討論的是，誰能判斷受訪者所言為真，當受訪者侃侃而談過去的採訪經驗、與消息來源的互動狀況、與媒體組織的應對策略、最後報導結果，以及事後來自報社與消息來源的反應時，如何確信所言為真？或許不是記者刻意說謊，卻可能是記者記憶的誤差、認知的偏頗，或是過度的自以為是，這是深度訪談法可以被挑戰之處。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新聞專業倫理強調的是客觀公正的真實報導，要達此目的，查證工作成為記者的必備程序與手段，而在進行新聞研究的當下，我們如何就深度訪談法所得到的資料進行查證以確認為真，在這樣的反思之下，研究結果同樣可以受到質疑與挑戰。

## 二、實務方面

學術研究目的之一在於回饋到實務上的進步發展，本研究對記者實際工作具有一定貢獻，讓記者認知所處工作環境中，不是只有直接控制才是控制，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更多時候對記者採取的是間接、柔順的控制手段，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在記者職場中雖屬不同團體，但會因兩者不同框架產生的連動，對記者形成不同的壓力情境。

本研究也提醒記者知覺自我控制力量的不可被忽視，有時自我控制力量甚至比直接的控制力量大，所以記者必須有抵抗意識，尤其在報禁解除、媒體電波開放後，記者來自對威權控制的反射性直接抵抗或許已難得存在（陳順孝，2003），抵抗意識的弱化，將使得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包裹糖衣侵食記者的新聞自主空間，因此我們強調記者迂迴抵抗的存在。這也啟發記者重新思考從事新聞工作的意義，是否僅僅只是在完成一份工作，如果記者無法抵抗、化解新聞採訪過程中來自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的控制，如何理直氣壯的報導社會真實？建構閱聽人的世界真實？要求閱聽人確信報導為真？

因此本研究提出記者抵抗權力控制的積極思考，希望記者平時就能累積抵抗資源儲備能量以備不時之需，本研究將記者可以累積的抵抗資源進行分類，包括記者的專業知識資源、職場地位資源，以及良好關係資源，並從資料中分析出更細緻的內容、方向與方法，這些都十分有利記者在平時工作中充實自己，讓自己更堅強。

但記者如此積極的抵抗作為，卻也一定程度觸動對新聞倫理的價值衝突。所謂新聞倫理指的是新聞工作者在其專業領域中對是非或適當與否下判斷的良心尺度，這包括新聞內容、報導過程與採訪手段等，而經常被各種新聞記者團體規範提出的倫理意涵包括社會責任、新聞自由、精確與真實、客觀與公正、公眾利益、高尚品格與專業表現（胡幼偉譯，1995；馬驥伸，1997）。本研究提出，記者應累積抵抗資源積極迎戰來自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的控制，即面臨新聞採訪倫理上的衝突，例如在記者新聞採訪常規中鮮少被研究的「關係」問題，本研究發現是記者非常重要的抵抗資源，分析發現記者平時就必須經常建立關係，以利日後新聞採訪，其中面子與人情是建立關係的重要手段，這與新聞倫理要求新聞記者應保持超然中立，不該接受人情包袱（包括飲宴、招待、饋贈、特惠、特別待遇、特權、兼差），也不該有感情包袱（政治意識、私誼）似有相衝突之處（馬驥伸，1997；羅文輝，1998）。本研究分析指出，記者為取得消息來源和媒體組

織信任，會特意報導一些能幫助消息來源，以及在媒體組織中累積戰功的新聞，為抵抗控制，記者可能會選擇不報導某些新聞，或以引導式訪問取得符合雙方要求的資訊，這部份也可能牽涉新聞倫理中對公眾利益或客觀公正真實報導界線的挑戰。

這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新聞倫理問題，記者面臨社會與媒體生態環境多變之際，原本新聞工作者所秉持的倫理受到多方挑戰，記者經常處在實務需求與新聞倫理的衝突間掙扎（方面萱，1998；林照真，1998；胡元輝，1998；孫秀蕙，1998；陳百齡，1998）。因此我們換個角度思考，記者做為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的中間人角色，當雙方不斷以其控制力道試圖影響報導時，記者的抵抗反而是一種將新聞拉回公正客觀界線上的力量。例如，本研究發現記者寫作知識是重要的抵抗資源，經常利用新聞的切割、用字潛詞的技巧，或以匿名消息來源報導新聞，試圖將媒體組織或消息來源的偏頗立場拉回趨近平衡公正的界線上，這樣的做法或已違背傳統新聞倫理信條，但或許這樣才更能走近新聞倫理的真諦。

記者採訪、報導新聞過程中，因必要手段而逾越新聞倫理的堅定界線，使得該界線變得模糊時，記者就必須重覆地在實務需求與新聞倫理間來回權衡、奔跑，而回到新聞倫理最原始、單純的定義：新聞倫理是新聞工作者在其專業領域中對是非或適當與否下判斷的良心尺度。它似乎已無法用刻板、制式、硬性的信條規範約束之，它是放在記者心中一把沒有明確刻度的尺，在面臨實務需求與新聞倫理的掙扎下，最終回答的問題將是：是否經得起良心考驗？

## 參、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行深度訪談法確實蒐集到豐富有效的資訊，但如先前方法意涵上所提出的質疑，研究者如何確信受訪者所言為真？這也是深度訪談法的不足之處，若再加入參與觀察法的輔助應該會更好，我們從文獻中看到，記者有時會過度想像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控制力量，有時又會在權力控制的場域裡而不自覺，如果能透過這兩種研究方法互補，獲取的資料應可更精確掌握實際情況。

然而礙於研究者本身的職業就是報社記者，若直接以記者身份在職場中進行參與觀察，將引發研究倫理上的討論，這也是本研究最後未採行參與觀察法的原因。

### 二、未來建議

本研究開啓記者與消息來源以及記者與媒體組織互動的新研究方向，建議未來可依此研究脈絡繼續發展，例如本研究分析記者受到媒體中層、基層主管的間接控制，未來或可研究記者在面對不同層級主管的抵抗是否有異？又例如，在職場地位資源的分析上，職銜與資歷深淺都是記者累積的抵抗資源，但這兩項資源的累積，對記者的抵抗意識是否也會造成影響？分析中提及專業學歷也是記者個人特質的累積，是否證明記者在職進修對職場工作為正面發展？而累積個人信用資源也成為記者重要抵抗資源時，未來或可從組織管理領域裡的組織信任研究出發，更深入探討記者與媒體組織和消息來源的信任研究。

過去鮮少將「關係」做為新聞研究主軸，本研究分析發現「關係」是記者重要的抵抗資源時，未來可進一步研究記者如何建立關係，以及記者建立關係與新聞倫理的衝突，都是可以繼續發展的研究主題。